



馮天瑜在武漢辛亥博物館開館儀式上代表學界致辭。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攝

馮天瑜簡歷：

1942年出生，湖北紅安人。1964年畢業於武漢師範學院。現為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專門史中國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86年被國家科委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2年劍橋國際傳記中心頒發「世界著名知識分子」證書。2010年11月16日，中共湖北省委命名表彰首批「荆楚社科名家」，馮先生名列其中。主要著作：《明清文化史叢論》、《中華文化史》、《中華元典精神》、《人文論衡》、《月華集》、《張之洞評傳》、《千歲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國觀察》、《新語探源》等。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余天麟

百年辛亥革故鼎新 社會發展應順潮流

廢兩千年專制帝制 開啟民主共和

馮天瑜教授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正值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的前三天。他為湖北省撰寫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英烈緬懷祭奠儀式祭文，「揮長劍，挽強弓，射落皇冠，帝制始廢除，思想解放；爭民權，謀民生，平等民族，共和成正統，圖建新邦」。馮天瑜奮筆寫下對百年辛亥的歷史評價：革故鼎新。他認為，辛亥革命所昭示的社會發展方向順應世界潮流，儘管過程曲折，尚存未竟之業，但是百年辛亥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不容質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鯤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軍工程營起義後，迅速控制中環門，參加起義的南湖馬炮營得以從此門入城。資料圖片



馮天瑜教授認為，辛亥革命尚存未竟之業。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攝

馮天瑜教授將辛亥革命定義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城市革命，對百年辛亥的歷史作用，他認為可以用「革故鼎新」概括。

革命爆發 歷史必然

所謂「革故」，是指辛亥革命革除了中國延續2100年之久的專制帝制，他強調，這是空前的貢獻；而「鼎新」，就是建立民主共和，他表示，雖然後來經歷袁世凱和張勳復辟帝制及軍閥混戰等數次反覆，有些人用這些來否定辛亥革命建立民主共和的意義，但是要知道，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着兩千多年專制帝制傳統的國家，不可能通過一個短暫的革命就完全解決問題，而這又恰恰說明民主共和目標實現之艱難，因而孫中山先生才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要徹底完成這種轉換是需要經過長期努力的，方向正確，順應世界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就是講的這個道理。

馮天瑜教授表示，種種史實說明，在當時中國的歷史條件下，體制內改良一再受挫，中國走「維持清王朝的框架，進行體制內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相當多的留日學生都走向革命，辛亥革命的爆發是歷史的必然，我們不能用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情況去反套歷史，得出當時不該革命的結論，當時不應該搞革命，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

反對專制 還政於民

馮天瑜教授交給記者一份講稿，論述「革故」和「鼎新」，其中一段標題是「終結兩千年專制帝制」，而不是大眾熟知的「封建專制帝制」，問及區別，馮天瑜教授首先指明，關於辛亥革命的任務，長久以來一直存在概念的混淆。「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講，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志士從來沒有把辛亥革命的主要任務定義為反對封建，他們都是講的反對專制！」辛亥革命從「民權主義」的角度來看，主要就是反對專制，還政於民和權力制衡。

錯誤概念 切勿強加

中國的封建社會在戰國末就已結束，隨後自秦朝至明清的兩千餘年，馮天瑜將其定義為宗法專制皇權社會，官僚政治是這種社會形態的主流，他表示，中國歷朝歷代都在進行專制皇權的循環，以一個皇權專制取代另一個皇權專制，這種循環重複了兩千餘年，而辛亥革命使中國跳出循環，今天之所以要這樣隆重的紀念辛亥百年，就是因為它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道路。馮天瑜強調，在談辛亥革命時，封建和專制帝制是兩個不能夠並列在一起的詞彙，泛化的封建概念已經被長久使用在辛亥革命歷史任務的表述中，後人在講「孫中山領導的反對封建專制帝制的辛亥革命」時，其實是將錯誤的概念強加於孫中山先生頭上。



荆楚文明積澱深 首義成功非偶然

馮天瑜教授是辛亥革命歷史研究權威，尤其在武昌首義史研究方面獨樹一幟，武昌首義之於辛亥革命是最為關鍵的一大歷史事件。今年4月，馮天瑜教授的著作《辛亥首義史》正式出版發行，而彼時正是教授的70大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中國歷史開啟一段風雲激盪的歷程。辛亥革命的範圍和地域是全國性的，但為何首義會爆發在武昌，馮天瑜教授解釋，儘管存在偶然因素，但是其中更有歷史的必然。

發動革命 首都太難邊境遠

辛亥革命重要人物宋教仁曾提出革命三策，上策在首都革命，但難度太大；下策在邊境地帶發動，但不能對清廷形成有效的打擊；中策就是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發動革命，而歷史證明中部起事的方案獲得了成功。

武昌起義，一夜激戰奪佔一座省城，次日，湖北軍政府成立，將同盟會的一系列政綱以佈告形式宣佈天下，創造了此前數次暴動都無可比擬的成功。馮天瑜認為，湖北革命黨人經過七八年對革命宣傳和組織，到武昌起義前夜，湖北新軍中有三分之一加入革命組織，三分之一的人傾向於革命，剩下的三分之一中只有一小部分頑固地站在清王朝一邊。革命黨人在各標營中都建立了代表制，武昌起義時一處打響，各標營都群起響應，這就並非偶然。

湖北新政 播洋務運動種子

馮天瑜強調，從更長遠的歷史階段看，武昌首義成功，與湖北擁有深厚的近代文明積澱有直接關係，張之洞1889年開始擔任湖廣總督，督鄂以後推行湖北新政，興實業，練

經歷革命的國共兩黨重要人物

1924年5月5日，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在上海莫尼埃路29號孫中山寓所舉行慶祝孫中山就任非常臨時大總統三周年紀念會。前排左起：鄧中夏、喻育之、孫鐵人、茅祖權、張繼、胡漢民、汪精衛、謝持、葉(名字不詳)、向警予。中排左起：周頌西、韓覽民、葉楚倫、王荷波、何世楨。後排左起：劉伯倫、毛澤東、向良、沈澤民、葛健時、羅章龍、瞿秋白、譚代英、鄒力子、周佩



辛亥革命旗幟 凝聚全球華人

辛亥革命的現實意義在哪裡？馮天瑜教授表示，不用空洞的口號，辛亥的現實意義就在於「革故」和「鼎新」兩點，這兩點都留下未竟之業。孫中山先生當年在《建國方略》中提出的眾多設想，還一度被人嘲笑，稱他「孫大炮」，說大話，而如今看來僅就湖北和武漢而言，建三峽大壩、在長江上修隧道、建設鐵路網、武漢成為長江航運中心等設想都成為現實。他續稱，回顧辛亥革命歷史，其現實意義仍可從「革故」和「鼎新」中得出。無論就革故還是鼎新兩點，都需要繼續沿着辛亥革命指出的方向去完善。專制帝制這一頁固然已經翻過，但是專制帝制的一些廣泛的影響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不可能很快的清除殆盡。辛亥革命在民主政治、建立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所指示的方向，留下的未竟之業還要整個國家進一步去完成。同時，辛亥革命是兩岸中國人和全球華人共同的遺產，在辛亥革命的旗幟下，可更好地促進全球華人的凝聚和團結。

港成近代文明窗口 港人支持功不可沒

記者：您認為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最為重大的影響在哪裡？馮天瑜：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城市革命，歷史上推翻前朝的革命幾乎都是在宗法社會農業經濟的基礎上發生的，多次發生的革命都是用新的專制王朝取代舊的專制王朝，雖有進步性，但國體政體社會形態沒有發生根本的轉變。辛亥革命是在近代文明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的基礎上爆發的，有了近代工業，近代文化教育，近代知識分子，近代新式軍隊，廣大市民支持，所以它才有新的訴求，孫中山在革命的醞釀階段就多次表示，反對滿清王朝的革命絕不是要請漢族人來當皇帝。

辛亥革命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最先進的民主共和國，因而它不同於以往任何一次舊式農民起義，這就是辛亥革命的價值所在。今天之所以要這樣隆重的紀念辛亥百年，就是因為它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道路。他結束了中國社會以一個皇權專制取代另一個皇權專制，這種重複兩千多年的循環。記者：辛亥革命在當時跟香港有哪些聯繫？馮天瑜：辛亥革命跟香港、澳門地區有很深刻的聯繫，港澳是較早受到西方近代文明洗禮的地區，香港是中國19世紀後期向內地傳播近代文明的重要窗口，包括孫中山在內的辛亥志士接受近代文化的洗禮是在香港完成的，孫中山在香港學習，閱讀大量的西方報刊，思想

有了新的轉變，具有現代意識和宏博的世界眼光，這些跟香港有深遠的關係。香港也是革命黨人組織發動反清暴動的基點之一，香港民眾亦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支持力量，通過捐款和直接參與支持辛亥革命。三民主義影響亞洲記者：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它對世界格局的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面？馮天瑜：辛亥革命時期，亞洲除中國和日本之外基本都淪為殖民地，這些國家處境跟中國相似，在他們尋找出路的時候，中國的辛亥革命給他們樹立了榜樣，亞洲各國帶有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先進人

物，在20世紀上半葉發動的爭取民族獨立的民族民主革命，都在相當的程度上受到辛亥革命和孫中山思想的影響。比如，印尼開國總統蘇加諾就多次提及他的思想重要來源就是孫中山，越南的革命領袖胡志明亦是從類似孫中山的革命道路走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對亞洲乃至整個第三世界國家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列寧在《亞洲的崛起》中就是從辛亥革命開始起筆，也可見辛亥革命對當時整個世界格局產生的顯著影響。如果把辛亥革命放到世界範圍內來看，我認為，它可以與美國的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相媲美。